● 作者/Mike Giglio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黃依歆

中共情報戰

China's Spies Are on the Offensive

取材/2019年8月26日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專文(*The Atlantic Online*, August 26/2019)

中共的間諜手法與威脅範圍日益提升，已與俄羅斯並列爲美國頭號間諜威脅。本文透過三名被中共吸納美籍間諜的故事，細述中共近期的攻擊情報戰與美「中」間的間諜攻防。

中共的間諜作為不論在範圍與手段上都日益精進。(Source: AP/達志)

2017年初，馬洛里(Kevin Mallory)陷入財務困難。在美軍、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下稱中情局)和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任職，領了多年政府薪水之後，他仍然未能付清貸款，尚餘23萬美元待償。雖然他後來跟許多情報官員一樣在退休後到民間企業任職，待遇也比過去好很多，但其財務情況依舊沒有改善，顧問工作也是載浮載沉。

據美國檢察官表示，馬洛里後來從其超過500個連絡人的領英(LinkedIn)帳號中接獲招募訊息。對方在中國大陸一家智庫任職，在網站上與馬洛里有5名共同好友，而中文流利的馬洛里過去擔任公職時，也曾去過中國大陸。招募者表示，智庫對於馬洛里在外交政策上的專業很感興趣。在收到領英訊息之後，一位自稱楊麥克的人打電話給他。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指出，讓馬洛里走上叛國之路的初期對話，都是帶有禮貌的官腔官調。搜查令內容顯示，楊

麥克當年2月寄給馬洛里一封電子郵件，表示「希望與您通個電話討論。」馬洛里回覆，「我會準備好，可以透過Skype網路電話連絡或打我手機嗎？」

不久，馬洛里就搭機前往上海和楊麥克見面。他後來告訴聯邦調查局，懷疑楊麥克並沒有在智庫任職，而是中共的情報官，但他當時對此顯然並未覺得不妥。馬洛里的中國大陸行開啟了這個間諜刺探關係，刑事控告書指出，他在隨後兩個月交出政府機密以換取2萬5,000美元的酬勞。與其他主流媒體一同追蹤該調查案的NBC新聞臺指出，聯邦調查局破獲馬洛里持有的一張數位記憶卡，內含8份有關諜報活動細節的機密與極機密文件。馬洛里還有一支楊麥克交給他的專用電話，用來傳送加密通信內容。雙方剛開始交流時那種禮貌而謹慎的語氣已不復存在，馬洛里在電話中告訴楊麥克，「你的目的是拿到資訊，而我的目的是拿到錢。」馬洛里因為出售機密給中共，遭美檢方以《間諜法》起訴，並於2018年春季被陪審團定罪。其委任律師聲稱他原本想要揭發中共間諜，但法官否定這種扮演雙面諜的說法，因為有許多其他間諜都會用此替自己辯護。馬洛里於2019年5月被判廿年有期徒刑；其律師打算上訴。

假設馬洛里是特殊個案，那他或許只是誤入歧途的退休情報官員與悲劇案例。但在過去一年中，還有另外兩名美國退休情報官員也因與中共有關的間諜案而認罪。這些案子是美國情報界的警訊，因為這顯示中共已與俄羅斯，同列美國的頭號諜報威脅。

2018年聯邦調查局逮捕熟稔中、俄文的59歲美國前國防情報局官員韓森(Ron Hansen)前，法院文件顯示其在過去幾年已從中共情報間諜手中拿到數千美元。聯邦調查局在刑事控告書中指出，韓森提供機敏情報資訊與受出口管制的加密軟體給中共。他向聯邦調查局供稱，中共情報官員在2015年初給他一年30萬美元的酬勞以「交換所謂顧問服務」。當他開始向某位國防情報局專案官員索取情資後即遭到逮捕。美國司法部表示，他所要求的資訊包含國防及「美軍在特定區域戰備現況」的機密文件。

54歲美國前中情局官員李振成(Jerry Chung Shing Lee)的案子或許是最撲朔迷離的一個。李氏在2007年從中情局離職後，遷居香港開始做生意，起訴書內容顯示其經營狀況不佳。2010年，中共情報人員與他接觸，提議以金錢換取情資。美國司法部指出，李氏密謀將機敏情報交給中共，並曾撰寫一份包含「中情局可能指派具經驗的官員至某些地點，以及該局某項機敏行動的特定地點與時間」之文件。李氏還擁有一份通訊錄，「內含其在2004年前擔任中情局專案情報官期間的工作筆記，包括……中情局人員提供之情報、人員真實姓名、行動會晤地點和電話號碼，以及祕密設施等相關資訊。」李氏洩密所造成的影響程度尚不得而知。雖據2018年NBC電視臺報導，美國當局懷疑李氏交給中共的資訊，可能是造成約20名美國間諜死亡或遭囚禁的原因，但後來雅虎新聞卻指稱該案其實是由伊朗所發動的大規模通信滲透行動所致。

當然，數百年來間諜與反間諜活動一直都是國

家機器的重要工具，而美「中」情報機關也早已纏鬥數十年之久。但近年來幾起案件卻透露雙方的情報戰正在不斷擴大，而中共竊取美國機密的作為，不論在範圍與熟練程度上都在提升。先後起訴馬洛里、韓森和李振成的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處處長德蒙斯(John Demers)向筆者表示，「我們能同時逮捕這三人，就可看出中共已將美國列為重點情蒐對象。只要想想要花多少心力同時吸收三個人，就能了解中共行動的實際力道。雖然還有些漏網之魚，但必須承認可能有一小部分中共曾經接觸過的人會做出同樣的事。」

許多間諜案並未公諸於世。某位因議題機敏而要求匿名的美國情報官員對筆者表示，「某些案件鮮少在法院曝光，因為我們不願拿機密資料冒險。有時這些人根本沒有被起訴，而是以其他方式處理。而還有一些仍未結案的案件現下或未來都不會公開。」

圖為56歲的美國前中情局官員李振成，2019年底因間諜案被判19年徒刑。
(Source: AP/達志)

在美「中」爭奪全球主導地位的態勢背後，這些近年發生的案件只是日益擴大情報戰的冰山一角，更只是中共遂行情報戰野心與狡猾的一小部分。隨著中共經濟與科技水準不斷提升，其間諜機關也不遑多讓：情報官員愈來愈老練，所使用的工具也日益強大，而不斷強化的各種間諜活動，已經讓美國情報機關陷於守勢。中共鎖定退休美國情報官員的作為只是其中一種手法，美國官員表示其他手段還有針對美政府資料庫與企業發動的網路攻擊、竊取民間企業貿易機密、運用創投基金獲取敏感科技，以及滲透美國各大學與研究機構。

就本質而言，諜報戰都是在檯面下進行，因此難以發現。但筆者在最近數周與多位美國現職與退休官員(包含美國反情報機關首長)對話時，這些身處美「中」交鋒第一線人員的說法顯示這場戰役有多麼慘烈，包含中共情報行動的方法、目標和目的，以及美國需要採取何種措施方能與之周旋。

中共在過去數十年來一直都在設法策反美國間諜。只不過

現在遊戲規則變了。大約十年前在加州蒙特里(Monterey)普雷西迪奧(Presidio)基地，萊特(Charity Wright)是一名在當地頂尖國防語言學院外語中心(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受訓的年輕學員。就像其他同學一樣，萊特搭計程車代步。基地大門有些計程車在排班。她經常碰到一位開計程車的老人，他自稱多年前從中國大陸移民到美國。由於萊特被派到該學院中文組進修，因此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遇見他。老先生好奇的態度讓萊特一開始覺得很親切，因為他問到萊特背景和家庭時，她可以順便練習中文。不過在幾個月過後，萊特開始起疑，因為老先生的記憶力似乎超乎尋常的好，而且問題也變得愈來愈特定：令尊以前是在那裡工作呢？妳畢業後會在軍中做什麼？因為這裡的學員以後多數都會從事情報職務，萊特曾聽過有關國外情報人員蒐集學員資訊、建立潛在吸收對象的基本資料。於是她向基地某位軍官回報老人的事。不久她就聽說老人被逮捕了，而且還因此在蒙特里破獲了一個疑似中共間諜的集團。

萊特接下來五年都在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擔任密碼語言分析員，負責評估從中共取得的通信截情資料。現在她已轉換跑道到民間網路安全公司任職。雖然成為備役軍人，但其仍然擁有美國政府許可資格，得以接觸機密資訊。因此萊特仍是那些她懷疑為中共間諜的目標。只不過最近幾年來，不會有間諜直接接近她，他們的作法與聯絡馬洛里一樣：透過網路。萊特從領英及其他社群媒體網站收過數次訊息，提供她在中國大陸各種機會：包含某顧問公司的合約，或以豐厚出席費邀請至某會議演說。這些提議似乎都相當誘人，但這種接觸技巧其實源自中共的間諜教戰守則。萊特對筆者表示，「我聽說他們都很會說服別人，等到你飛過去時，已經成為他們的囊中物了。」

萊特觀察蒙特里老人所使用的戰術是「簡單明瞭的人工情報」作為。這些手法相當老派，現在卻能透過社群媒體工具強化其效果，如此一來中共官員便能在中國大陸直接接觸目標，完全不會有被逮之虞。同時，多位情報專家向筆者表示，中共情報官員在說服目標對象背叛祖國的傳統技巧上只有愈加純熟。

川普外交政策的核心面向係對中共採取強硬態度。他所關注之貿易戰及關稅，目的在扭轉其所稱不公平經濟競爭場域。2019年8月，美國將中共列為貨幣操縱國，但同時維持將中共政治強人習近平視為盟友和朋友的想法。美國政治與企業領袖數十年來所擁護的理念，是認為與中共進行貿易有助其行為正常化，但北京當局肆無忌憚的間諜作為卻促使華府朝野兩黨逐漸形成共識，開始認定此希望已然落空。從2017年開始，美國司法部至少已對疑似效命中共當局、從事網路與經濟間諜活動的間諜提出十餘例起訴案件。德蒙斯向筆者表示，「之前的希望是隨著中共發展，人民會變得更富有，其開始加入已開發國家之列時，中共就會開始改變自身行為；其愈接近頂峰，就會用西方的規則運作。但最後結果卻是中共在竊取情資方面變得愈來愈老練且細膩。」

過去廿年來，美國情報體系的優先任務一直是反恐。整個世代的官員和分析人員都在準備搜捕

並格殺美國的敵人及防止極端主義分子攻擊，而不是備便大國競爭與反情報等更具耐心及戰略思維的工作。假如美國真的將進入一個與中共的「大國」衝突時代，這場角力最激烈的地方很可能不是在戰場上，而是資訊上的競爭，至少目前是如此。中共在這方面運用的是人類天生的弱點──貪婪──來與更強敵人競爭中占得優勢。美國官員不斷警告其企業和研究機關，許多線索都與中共資金有關，且貪腐職員也可能變成間諜。這些官員也擔心有責任保護國家機密之現職與離職官員的行為。

當筆者告訴美國高層反情報官員艾文尼那(William Evanina)關於萊特在蒙特里遇到老人的故事後，艾氏回答：「預料之中。」

艾氏向筆者表示，間諜集團以計程車為工具早已司空見慣，且這一直是美國軍事與情報設施地點附近存在的問題。艾氏過去長期於聯邦調查局與中情局服務，現在則擔任「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主任，其對所有事情都持懷疑態度，且可能是全美最不喜歡優步(Uber)的人。他認為這類車輛都存在情報蒐集與隱藏攝影機的風險，而只要計程車司機想和他聊兩句，他會斷然拒絕。

了解某人背景有助情報機關製作未來吸收行動的基本資料。這個人可能有堆積如山的醫療帳單、雙親負債、手足坐牢或任何可用來勒索的婚外情。艾氏真正憂心的是，此類資訊現在多半可以透過網路管道以合法或非法方式取得。人們可以不理優步司機的搭訕，但高明的駭客或熟稔社群媒體搜尋的人，卻可以成功追蹤目標對象的財務紀錄、政治觀點、家人基本資料及預劃的旅遊行程。艾氏表示，「這讓資訊取得變得太簡單了！」

發生安全漏洞的頻率令人感到憂心。2019年7月，美國第一資本銀行(Capital One)宣布，其資料遭駭外洩導致上億民眾個資曝光。在筆者與萊特的一次對話中，她想著不論當年那個開計程車的老人希望獲得什麼資訊，也都可能會隨2015年美國人事管理局資料外洩案而曝光。在那次縝密的攻擊行動中，外界咸認那應是中共支持的駭客所發動。有大量資料遭竊，包含政府當局在核定安全許可資格過程中所蒐集的詳細個資。《連線雜誌》(*Wired*)指出，那些遭竊的資訊包含「詢問申請人有關個人財務、過往濫用藥物和心理治療等資訊」，甚至「所有從測謊結果測得有關申請人是否從事危險性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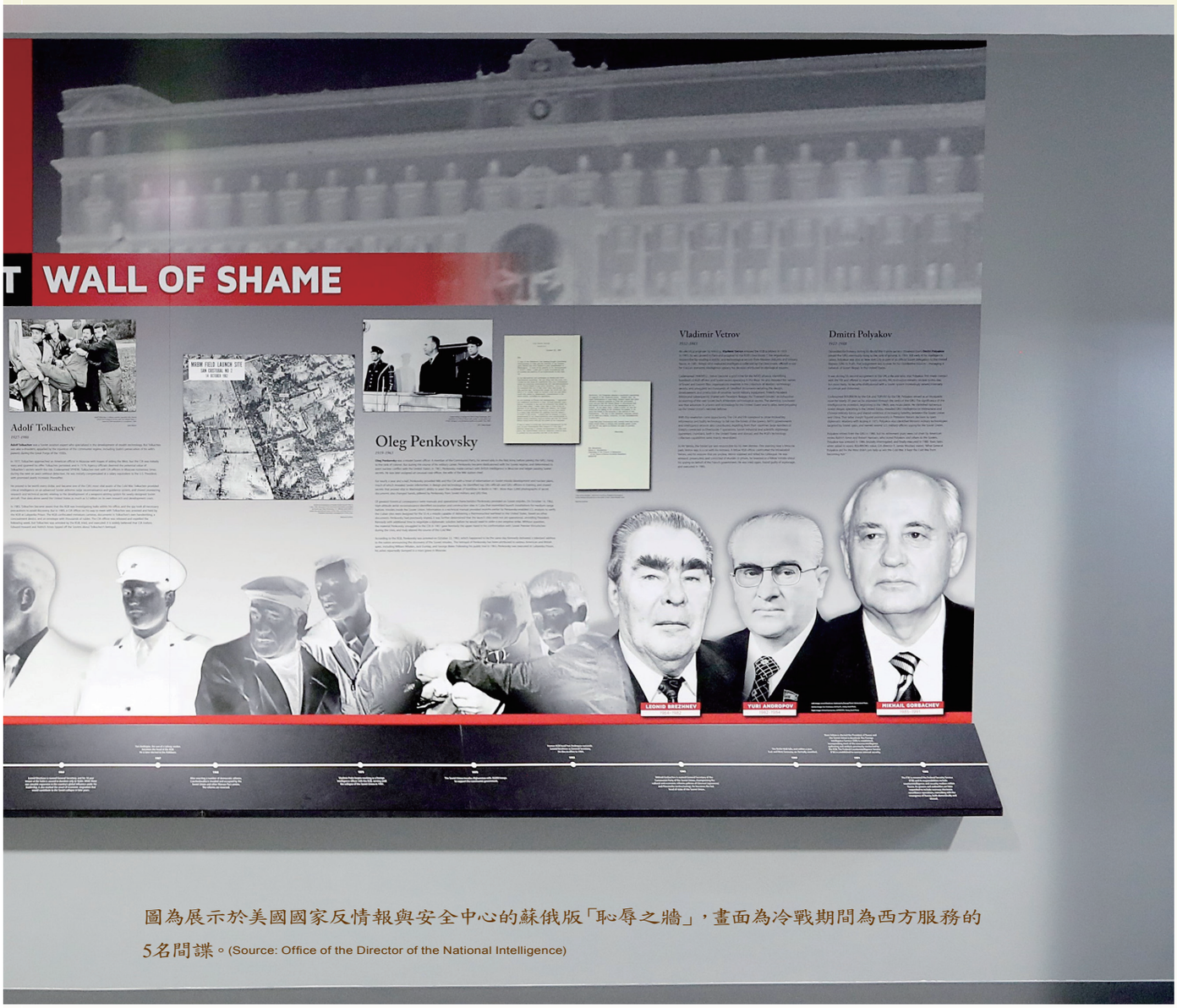
艾氏表示，俄羅斯──這個在探討近乎實力匹敵的衝突中常與中共相提並論的美國對手──在吸收間諜時的慣用手法與美國相仿。雖然俄羅斯的某些情報作為，諸如選舉干預等，都是毫不遮掩且肆無忌憚，且似乎不在意是否會遭看穿，但其在設法策反某些重量級目標時卻非常小心且具針對性。俄羅斯通常會派出資深情報幹員親自接頭，過程謹慎且充滿耐心。艾氏對筆者表示，「他們最糟的情況就是被逮捕。俄羅斯人對於自身人工情報行動十分自豪，他們鎖定目標的能力很強，且會花更多時間以提升成功率。反之中共間諜在這方面不太在乎。」(艾氏補充說，這並不代表他們在必要時，不會同樣謹慎且鎖定目標)。

艾氏表示，「現況是情報官員只要坐在北京，

一天就可以傳送3萬封電子郵件。而他只要獲得300個回覆，就可稱得上是一回高報酬、低風險的情報行動。」那些雖然已經離開公職到民間企業任職的人，有時仍然保有安全查核許可，可繼續從事機敏的政府任務，但有時很難拿捏其中界線。艾氏表示，中共有時在鎖定某些離職官員時可以等上數年之久：「你的職業敏銳度雖然降低，但記憶卻沒有消失。」換言之，他們身上仍有中共想要的資訊。

通常，中共的間諜甚至根本不須太費力尋找目標。許多離開美國情報部門的人，都會在領英網站上註明過去的工作機關、國別及業務。假如他們仍然保有政府的查核許可，也可能會顯示在資料上。艾氏在參議院任命審查的問卷中，有一題問到在離開公職後有何生涯規劃，他的答案是「我目前完全沒有任何規劃。」筆者問及此點時，他承認這種情況在同年紀的情報官員中愈來愈少(艾氏現年52歲)。他表示，「我所有朋友都拼命離職，因為他們都有小孩在讀大學。外面薪水較高，因此很難拒絕。」

假如離職情報官員是到知名政府的承包商任職，諸如博思艾倫諮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或戴恩國際集團(DynCorp International)，那薪資可能相當優渥。但其他人的報酬可能就沒那麼高，甚至得設法自己創



圖為展示於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的蘇俄版「恥辱之牆」，畫面為冷戰期間為西方服務的5名間諜。(Sourc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業。艾氏向筆者表示，中共情報人員會在網路上偽稱自己是中國大陸教授、智庫專家或企業主管等。這些人通常會提議赴中國大陸一遊的生意機會。艾氏指出，「尤其是那些從中情局、國防情報局退休，目前擔任約聘工作的人，他們必須設法賺錢。這些工作機會很多都在中國大陸，導致他們遭中共吸收。」

當目標對象抵達中國大陸後，中共情報人員可

能設法讓這個人開始一點一滴透露某些機敏資訊。最初可能只是一些無關緊要的資訊，但此時陷阱早已設下。艾氏表示，「當他們拿到第一個信封袋時，就會拍照。然後中共情報人員就可以威脅你，於是你就無法脫身了。接著一份文件，變成10份文件，然後是15份。此時你在心理可能會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我不是間諜，這都是他們強迫我做的。」

艾氏指出，以馬洛里、韓森及李振成等個案為例，誘因並非意識形態，完全只是為了金錢。金錢也是另外兩個類似個案的誘因，只不過其嫌疑犯後來以不到間諜罪的刑度遭定罪。這兩項案件中，嫌犯與中共情報官員開始建立關係時，明顯皆仍在美國政府擔任機敏職務。

2016年，擁有極機密安全查核許可的聯邦調查局資深職員秦昆山，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是中共間諜。檢察官表示，秦氏任職於該局在紐約的辦公室時遞交給中共「至少有關聯邦調查局人事、組織、科技能力等相關資訊，以及該局偵察策略的一般資訊與偵察目標的某些項目。」4月時，美國國務院離職員工卡賴伯恩(Candace Claiborne)承認其陰謀詐騙美國政府的罪行。據刑事控告書內容，曾在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等多國駐外使館任職過的卡賴伯恩，擁有極機密安全查核許可，卻沒有回報與疑似中共諜報人員的接觸史，這些人給予她及另位同謀者「數萬美元的禮物與利益，」包含新年禮物、國際旅遊假期、時尚學院學費、房租和現金等。檢察官指出，卡賴伯恩則以多項國務院文件與分析副本作為交換。

艾氏在馬里蘭州貝什斯達的辦公室有一道「恥辱之牆」(Wall of Shame)，上面掛著數十位遭定罪美國叛徒的照片——這是長期為禍美國情報體系的明證。例如，冷戰時期中情局官員阿密斯(Aldrich Ames)和聯邦調查局幹員漢森(Robert Hanssen)的毀滅性洩密案；1985年，中情局翻譯官金無怠(Larry Chin)因連續出賣機密資訊予中共長達三十年而遭到逮捕。該年就是美國所謂的「間諜年」(Year of the Spy)，聯邦調查局發動了一連串高調行動，逮捕多位為蘇聯、以色列，甚至迦納擔任間諜的美國官員。「恥辱之牆」在2019年秋天重新裝修後掛上了幾張新臉孔。

只要發生現職或離職美國情報官員變節，都得花好幾年時間才能評估全般影響。艾氏表示，「我們有時得花十年才能減輕既成傷害。」某位研究中共多年的美國前情報官員對筆者表示，廿年前中共情報官員大體上仍相當外行，甚至懶散。通常他們的英文都很差、行動笨拙，且使用易被發現的身分掩飾自己。這些假扮成平民的共軍情報人員，通常都隱藏不了軍人特質，而且表情僵硬的程度也令人莞爾。他們的主要目標對象往往是華裔人士。但近年來，中共情報官員變得愈來愈老練，外表看來文質彬彬、風度翩翩，甚至像出身上流。他們的舉止從容，英文往往不錯。某位基於安全顧慮要求匿名的前官員對筆者表示，「現在這已是常態。他們真的學到很多且成長快速。」

前中情局資深資訊分析師法若恩(Rodney Faraon)向筆者表示，馬洛里和韓森的案件顯示中共間諜機關進步很多。他指出，「他們使用戰術的範圍已從難度較低的目標對象向外擴大，從原本僅

吸收華裔社群，擴大到更多元的人口。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變得更為傳統。」

前中情局祕密行動機關資深官員暨該局前反情報主管歐爾森(James Olson)在其近期出版著作《捕捉間諜：反情報的藝術》(*To Catch a Spy: The Art of Counterintelligence*)一書中，破解中共間諜機關的基本特質及運作方式。中共國家安全部(下稱國安部)是其主要機關，專責海外情報。公安部則是負責國內情報，但也會派遣間諜到海外。共軍則把重點放在軍事情報，「但其對自身角色界定十分廣泛，除了較為傳統的軍事情報標的外，還在諸多海外經濟、政治與科技情報蒐集行動上與國安部競爭。」歐爾森進一步指出，「共軍從事大部分」的中共網路間諜活動，但國安部也可能刻正擴大此領域能量。同時，國安部與共軍「在美國的行動中，經常以外交、商務、新聞和求學等身分為掩護。他們積極利用到美國旅遊的中國大陸人，尤其是企業代表、學界人士、科學家、學生和觀光客，輔助其蒐集情報。美國情報專家對於中共在情蒐上的渴求深感驚訝。」

歐爾森強調，中共「一直很擅於間諜行動」，但在描述其今日諸般作為時仍是語帶驚訝。「假如我在中情局的職涯重新再來，我一定會設法加入中共專案部門、學習中文，同時讓自己成為對抗中共的反情報專家……今日美國反情報工作的優先事項及未來，必然是如何遏止或大幅限制中共的間諜活動。」

假如連美國諜報老手都會遭中共間諜活動滲透，美國企業的情況可能更糟。在某些狀況下，中共會同時鎖定民間企業和美國國安機關。目前任職於某參與美政府高度機敏專案之知名美國航空公司的美國前安全官員對筆者表示，該公司內部發現一名與中共連繫的可疑情報蒐集者。消息來源因偵辦中的司法調查而以匿名受訪，「我認為他一定受過相當專業的訓練。」

這名前安全官員於該公司專責監控此類威脅，且一開始就發現該企業缺乏有效的防範措施，訓練不足的情況更令人咋舌。他表示，「當我進入公司並聽取簡報時，我以為那是個笑話……現在我們雖已採取某些措施來防範類似內部威脅，但某種程度上那仍有如門戶洞開。這家公司在防杜外國情報威脅方面的能力真是驚人的不足。」

某種程度上，吸收美國諜報人員和政府官員在情報界是容易的目標。美國也對中共還以顏色。美國喬治亞大學榮譽教授、《諜眼：美國的情報究責》(*Spy Watching: Intelligence Account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作者、全美最頂尖情報學者之一的強生(Loch K. Johnson)以電子郵件向筆者表示，「情報行動是普世行為，各國或多或少都會從事情報行動。」他進一步指出，雖然幾乎所有國家都會建立蒐集敵人資訊的能力並防杜敵方諜報行為，但僅有極少數國家擁有得以從事祕密行動的有效網絡，強生稱此為「機密宣傳、政治與經濟操弄，甚至是準軍事活動。」美國和中共都屬於上述少數國家之一。

強生表示，「美國在冷戰時

周泓旭涉及首宗陸生共諜案遭羈押後，於2019年遭我最高法院判刑1年2月定讞。(Source: Reuters/達志)

期曾採取各種宣傳、政治與經濟行動，冷戰後亦是如此(只是侵略性降低而已)。中共則是還以顏色。兩國都是大國，且擁有全般情報能力，專門針對彼此及其他世界各國重要目標對象進行情蒐。這意味著美國(反之中共亦然)一直不斷設法了解中共在軍事、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活動，因為這些活動可能影響美國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國家利益。」強生表示，為達此目的，美國運用信號情報、地理空間情資及人工情報等手段，但「全都會透過積極搜尋既有(且大量)公開資料了解其背景。」

但其特別強調兩國之間的重要差異是：中共從事經濟間諜活動的積極手段。這些作為是迫使美國政府官員與政治人物改變想法，認為中共沒有遵守遊戲規則的原因。美國政府官員堅持美國情報機關不得為了達到幫助國內企業之目的而對外國企業進行情蒐(然而美國針對外國企業進行之間諜活動以維護國家經濟與戰略利益，該諜報活動是否圖利美國企業，其中界線十分模糊)。2013年時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的克雷伯(James Clap-

per)在國安局爆出監控外國企業情資後表示，「我們說過許多次了，絕對不會運用對外情蒐能力竊取外國企業的貿易機密，用以幫助(或提供情蒐資料給)美國企業強化其國際競爭力或增加收益。」

2016年以中情局東亞暨太平洋處副處長之職退休的魏爾德(Dennis Wilder)向筆者表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手法，最大特點在於其領導人事實上一直認為美國威脅其生存。他指出，「這是中共情報的不變主軸，亦即不只是出去竊取機密、保護自己，而是認為美國的真正目標是共產主義，正如同當年美國對付蘇聯一樣。」

目前因為擔任喬治城大學美「中」交流專案主任而仍須訪問中國大陸的魏爾德向筆者表示，中共官員經常提起過去美國的祕密行動，諸如中情局從1950年代開始支持西藏獨立運動最後不幸失敗，以及從臺灣派遣間諜滲透中國大陸等。因此他們仍然認為如今日香港抗議活動等事件仍能看出美國介入。魏氏表示，「因此我們所有人還坐在這裡抓頭苦思並問自己『他們真的相信我們在香港搞鬼嗎？』而答案是，他們的確這樣想，確實認為美國的根本目的就是毀滅並終結共產主義。於是乎，如果你相信另一個人打算毀滅你，一切都會順著這個方向思考。因此對中共而言，竊取、間諜，及對美國企業發動網路間諜活動以爭取國家利益，都只是在對抗這個強大敵人時，爭取自身生存的部分必要手段。」

中共否認美方官員所懷疑之大規模對美間諜活動。在被問到本文所指之相關細節時，位於華府的中共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方虹(Fang Hong)透過電子郵件回覆稱，她完全不知道有關馬洛里、韓森、李振成及其他人的案件。方氏表示，「中共一向完全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且不會干預他國內政。」方虹也嚴厲批評美國肅清中共間諜的作為，並引述美國偉大作家曾說的一句話。她指稱美國對中共間諜行為的想法，「讓我想到馬克吐溫曾說過：『對於一個拿著鐵錘的人來說，所有東西看起來都像釘子』。」

方虹進一步表示，「美國官員對於中共留學生和研究人員的指控毫無根據。完全都是源自圍堵中共的零和遊戲心態和不良居心，有些美國人和機關一直捏造如間諜活動這類荒謬藉口，當做騷擾這些人與提出毫無根據指控的理由。」她補充說，無辜民眾在某些案件中被羅織入罪，而「此種不實指控嚴重傷害『中』美兩國人民的交流、科學和科技合作。」

2018年期間，美國司法部連續起訴多名個案，凸顯中共諜報作為的全面特質：包含某位奇異公司工程師被控竊取天然氣與蒸氣渦輪相關貿易機密(他否認犯罪)；一名美國人和中共人士被指控企圖竊取塑膠相關貿易機密(美國人否認犯罪而中共人士直至2019年3月止都未向美國法院報到)；一家中共國營晶片廠和一家臺灣半導體製造公司被控竊取美國競爭對手的機密(該晶片製造廠否認犯罪)；兩名中共駭客被控駭取智慧財產(中共否認這項所謂「妨礙名譽」的經濟間諜指控)。2018年7月，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Christopher Wray)在參議院聽證會中表示，該局「在全美各地可能有

高達千餘件有關企圖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的調查案……而幾乎全部都指向係中共所為。」

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官員德蒙斯向筆者表示，中共使用類似戰術，甚或某些同一批情報官員從事滲透美國企業的間諜活動。他指出，「此事顯示中共當局十分嚴肅看待竊取智慧財產權作為，因為他們真的派出情報部門的菁英，並使用最縝密且專業的技巧。」

中共遭控竊取的某些貿易機密，似乎單純只為了幫助特定公司或產業。然而，中國大陸企業和中共當局的界線往往並不清楚。中共法律強制要求所有企業在國家安全議題上都必須和政府合作。這是美國官員在2019年初宣布起訴中共電信巨擘華為時，所提出的憂慮之一；川普政府已明令禁止美國企業與華為進行商業往來(華為否認犯下企圖竊取美國貿易機密的行為)。

德蒙斯向筆者表示，中共將經濟諜報活動當成一種「研究發展」型式。「他們還是有一些非常有天份且聰明的人將資源用在正途，我認為現在讓大家感到很沮喪的是，你原本可以用其他方式達到目的。可以公平競爭，對吧？你並不是一個孱弱的瘦小子，必須靠丟人眼睛泥巴才能贏。」

美「中」之間的開放商業氛圍(這種氛圍在冷戰時期並不存在美蘇之間)導致處理中共間諜行為時更為棘手：因為中共既是競爭對手，又是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的經濟與研究合作關係讓雙方獲益。同時，中國大陸

2019年9月，美國司法部指控華裔導遊彭學華為中共國家安全部提供美國國安機密。(Source: AP/達志)

移民和來訪人士在美國官員未能找出適切平衡的情況下，又可能成為不公平的打擊目標，此種情況將使兩國的正當交流受到波及，同時讓人懷疑美國在冷戰和全球反恐戰這兩場鬥爭上的過度反應是否又復發了。美國官員對中共間諜活動威脅提出示警，而美國情報體系也重新將此列為重點，他們仍須小心避免損及美國價值，亦即態度開放、公民自由及企業精神等，這仍是目前美國對抗中共最大的優勢所在。

在柯林頓與小布希政府時代曾任中情局「總統每日簡報」(President's Daily Briefing)小組成員的法洛恩，目前是商業情報公司「克倫普頓集團」(Crumpton Group)的合夥人，他向筆者表示未來不僅必須靠美國情報機關，也需要美國政府全體努力推動，才能找到一套正確戰略。川普政府雖然在貿易談判及其他議題上採取強硬姿態，但在尋求正確戰略上仍未見力道。法洛恩指出，「這必須採取政府一體的方式並與民間企業共同合作。中共比我們更會運用且更重視情報，就因為其深知情報幾乎可以應用在民間和政府部門的所有面向，包含軍事、社會與商貿。美國在這方面卻還是慢了一步。」

作者簡介

Mike Giglio係《大西洋月刊》情報與國家安全議題編輯(staff writer)。